

思想

REFLEXION 11

民主社會如何可能？

何東洪 / 我的野草莓雜記

趙剛 / 重思紅衫軍

王明珂 / 學術認知與人道關懷

梁文韜 / 金融大海嘯的啓發

祖旭華 / 政治人物與道德

吳介民 / 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

陳閔翔 / 德沃金訪台側記

鳥瞰當代西方哲學

C55
2003

思想

REFLEXION 11

民主社會如何可能？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沈松橋、汪宏倫、林載爵

陳宜中、單德興

聯絡信箱：reflexion.linking@gmail.com

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reflexion/



思想11

民主社會如何可能？

2009年3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6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編 發	著 行	人	思想編輯委員會 林 載 爵
--------	--------	---	------------------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27634300 轉 5226
總 經 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台北忠孝門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71234 ext. 5
高雄辦事處：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2樓
電話：(07) 221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76837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沙 淑 芬
校 對	吳 以 喬
封面設計	蔡 婕 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78-957-08-3388-1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目次

學術認知與人道關懷：川康震動的反思

王明珂.....1

去年青藏高原東緣發生劇烈的自然災難與社會動盪，我作為羌藏族研究者，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在這過程中，我對問題核心的「民族」、「文化」、「歷史」與人道關懷，皆有些深思。

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

梁文道.....19

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有一半是漢人自己的問題，不只對西藏的民情文化沒有起碼的認識和尊重，更對複雜纖細的民族問題毫不敏感。

金融大海嘯的啓發：

馬克思、全球經濟冰河期及消極共產社會

梁文道.....29

本文嘗試勾劃修正後的馬克思式想像，展示所謂的消極共產主義，特徵是全球經濟冰河期，經濟蕭條、物質匱乏，即使各盡所能亦只能維持基本生計的悲涼境況。

網絡生命政治在中國的浮現

劉世鼎.....57

在一個社會性逐漸被剝離的生活世界裡，網絡抗爭是否創造出了一種新的社會運動？這些自主性的抵抗是否能有效影響政治決策和體制？

藍綠之外

民粹文革十五年：重思紅衫軍及其之後

趙剛.....81

企圖對紅衫軍群眾的內在道德與精神焦慮提出歷史解釋，就必須把背景拉回到十多年以來的民粹文革，以及讓這個民粹文革得以滋養的兩岸分斷體制，以及日本殖民統治的當代存在。

我的台北「野草莓」雜記

何東洪.....119

我以為把運動界定為因世代的差異而特殊化，或是同世代間議題的差異而忽略了自身的反省與局限，將是「野草莓學運」的悲哀。

民主社會如何可能？： 二十年台灣經驗的反省

民主社會如何可能？

李丁讚.....135

我們要問「民主社會如何可能」，其實就是在問，民主制度與社會脈絡如何接榫、磨合，進而有機地連結起來。

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

吳介民.....141

中國因素由外而內，貼近到台灣的現實生活。如果不認真看待這情勢，不但會錯失形塑良性中國政策的契機，社會內部藍綠分歧惡化，台灣作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民主國家地位，也將遭到動搖。

關於民主社會的幾點想法

黃長玲.....159

有強烈國家認同的社會不見得是民主的社會，但是重視個人權利與社會團結的社會，很少會不發展出自己的認同。民主化一定會帶動本土化，但是本土化不一定會帶動民主化。

民主社會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顏厥安.....163

我認為民主社會不是民主制度出現的必要條件，但卻是民主體制深化、鞏固，乃至於長期比較穩定維繫的必要要素。

必要的民主：他——我對抗抑或你——我平等

錢永祥.....173
因為我們勇於對抗，選舉民主已經可能；但因為我們耽溺於對抗，超越選舉、超越對抗的民主更有必要。

公共領域、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

林國明.....181
如果沒有實質的理由，講不出任何可以說服公眾的道理，光憑多數決的程序原則，如何能使人民，尤其是自覺受損的少數群體，同意政策決定是正當的？

民主社會的結構可能性條件

湯志傑.....197
我們的民主不但沒有發揮它變革的力量，反而為既有政治優位的社會結構所吞噬，並因此賦予這套新的封建分贓秩序形式上的民主正當性。

民主社會是一種共治：代結論

李丁讚.....201
「領導」本來就不能靠多數決來領導，而必須積極與社會各種力量協商，創造一種平等基礎上的共識。社會普遍參與，並與政治一齊努力，這就是共治。因此，民主社會就是一種共治。

政治與道德

政治道德與日常道德：一種解救政治與道德悖論的嘗試

馬華靈.....221
筆者把道德區分為「政治道德」與「日常道德」，讓政治與日常道德分家，從而避免烏托邦政治；讓政治與政治道德聯姻，從而避免流氓政治。

政治人物與道德：論政治黑手的兩難

祖旭華.....233
如果選擇了不能幹的好人，我們的手是乾淨的，但犧牲了公共的利益。如果選擇了能幹的壞蛋，我們自己也成了黑手。黑手的兩難也考驗著我們自己。

思想訪談

走過蝶道：吳明益訪談錄

黃宗潔.....251

我一直認為神一定很痛苦吧，尤其是掌管心靈或祈願的神，一定痛苦得不得了。
（如果菩薩知道痛苦是什麼的話。）

思想鉤沉

後革命時期的革命書寫

陶東風.....265

後革命時代的革命書寫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種出現在新啟蒙時期；第二種出現在1980年代後期，屬於對革命的倒退式書寫；第三個階段是犬儒主義或歷史虛無主義階段，戲說革命是其基本特徵。

阿摩司·奧茲的夢想

雲也退.....287

鼠年末尾，加薩的砲火再度敲中人們對中東問題暫時休眠的神經。在為期幾周的衝突裡，奧茲基本上保持著沉默：他還能對當下說些什麼呢？

思想采風

德沃金訪台側記

陳閔翔.....307

政治預言家杭亭頓逝世

陳瑋鴻.....315

鳥瞰當代西方哲學：《哲學家雜誌》的專題報導

劉俊麟.....319

致讀者

.....327

學術認知與人道關懷：

川康震動的反思

王明珂

2008上半年，中國大陸西部地區連續發生一些震驚國際的大事。3月中旬先在西藏拉薩，接著在甘肅夏河、四川阿壩、甘孜等地，發生藏族聚眾示威抗議與衝突事件。5月中旬川西連續發生嚴重地震，沿川西龍門山脈的汶川、北川、青川等城鎮鄉村嚴重受災，逾10萬民眾死於災難，數百萬人失去家園。

1995至2003年，我幾乎每年都要到汶川、茂縣與北川一帶作羌、藏族的田野調查；2003至2007年，我的田野研究轉移到略靠西邊的康藏河谷與高原。因而當西藏事件發生而康區擾動的那幾天，我一直擔心著我的藏族朋友們。川西大地震之後，我也忙著探詢羌族朋友們的安危，並將我所知的訊息提供給救災機構、志願者與關懷災區的媒體。同時也擔憂，我正在進行中的康區（青藏高原東緣）研究計劃是否將受這些政治與自然災難影響而停頓。因此今年3月以來，我經歷了自己學術生涯中最忙碌也是最複雜的一段時日；從事了不少不太學術的活動，也讓我深思學術與現實間的關係。

首先，對於3、4月間發生的西藏事件，中西方展開一場學術、文化與政治均捲入的媒體大戰。中國媒體強調西藏平民與僧侶暴徒的非法破壞行為，達賴集團及西方支持藏獨組織的挑撥。大多數歐美媒體則基於人道關懷，指責中國對西藏的長期政治控制、經濟剝

削與對藏族文化的破壞。在川西大地震發生後，由於10萬死難者中有3萬餘人為羌族，汶川及北川等城鎮中大量羌族文物毀損，因此羌族災民應如何被安置，移民外地是否會造成其文化流失，羌族文化應如何受到保護與重建，這些議題都受到中國官方、學界深切關注，也產生許多爭議。

這其中涉及的一些概念與辯駁，譬如，什麼是民族？什麼是文化？什麼是可放諸四海的公義(universal justice)與人權？以及學術(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國際法學等等)是否能基於其客觀理性之分析邏輯，提供正確解答與理想方案以解決爭端？學者應扮演何種角色：在學術研究中以創新的詞彙、深奧的理論，生產出一些僅有少數人能理解而宜用以升等的學術著作？或在對社會現實與人道的關懷下，以知識(與知識權力)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試圖扭轉局勢以實現其心目中的理想與正義，以拯救其心目中的受難待援者？我一直自豪於身為學術群體的一成員。當今歲青藏高原東緣發生如此劇烈的自然災難與社會動盪時，許多學者紛紛投入羌族災後社會文化搶救工作，以及參與漢藏問題之辯駁；我作為青藏高原東緣的羌藏族研究者，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在這過程中，基於對本地羌、藏族的理解，我對問題核心的「民族」、「文化」、「歷史」與人道關懷，皆有些深思。

民族

在川西震災中，透過新聞報導最令人矚目的災難似乎是：10萬受難者中有3萬餘人是羌族，羌族死難者占羌族總人口約十分之一。災後不久，一架救難直升機失事，一位死難的解放軍空軍軍官亦為羌族。羌族朋友激動的告訴我，這一來羌族空軍失去了二分之一。

在救災先後與災後物資發放上，我也常聽得這樣的問題。有的羌族人抱怨，他們村寨得到的救援最晚也最少。有的藏族抱怨，大家都注意羌族受災情況，而忽略了藏族村落受災同樣嚴重。有些漢族人也抱怨，少數民族在災後受到特別關注，但死於震災最多的是卻是漢人。以上人們對震災的哀慟與對救災的抱怨，皆不一定或不必與「民族」有關聯，但人們在思考與爭辯這些問題時，自然而然的，「民族」成為終極關懷。

「民族」的現實意義及其令人困惑之處在震災中被突顯出來。所有的災民皆應作為國家公民或作為「人」而受到救濟？或者他們應被歸類為各「民族」或「少數民族」而受到特別關注或遭到忽略？我們將此思考擴及災民之外。在當代國家中每一個人皆為「國民」，此外，是否他們又屬於一個「民族」或「族群」，如中國大陸的藏族、羌族、彝族，如台灣的泰雅族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這些民族或族群範疇是原生的、有悠久歷史的，或是當代人的想像與建構，藉以在國家中造成有社會階序等差之各個次群體？若將焦點轉移到西藏與康區，我們仍遭遇類似的問題。藏族普遍被視為一個有獨特語言、體質、文化、宗教與社會的「民族」。爭執只在於，這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或者她是個與漢族截然不同的民族，因此應獨立於中國之外或享有高度自治？

1990年代中期，我在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羌、藏族中進行有關族群認同與歷史記憶的田野考察。那時，當地許多人都承認，在1950年代以前他們沒聽過羌族、藏族，當然也不知道自己是啥民族。在文獻資料中也是如此。許多民國時期的方志、遊記，都稱康區各族群為「西番」。當時也無羌族，只在汶川一帶有些被記載為「羌民」的人群。川西阿壩州黑水縣的小黑水，本地各部落人群還被稱作「獐獐子」；因為他們太野蠻，附近的「西番」與「羌民」都不願承認

和他們有任何關係，有些文獻甚至稱他們為「獐獐子民族」。1996年我在北川青片鄉訪問一上五寨羌族老人，在訪談中他口口聲聲稱「我們藏族……」，聽得陪同我前往的羌族幹部直皺眉頭。後來，這幹部連連埋怨：「跟他說了多少次了，他還是搞不清自己是羌族還是藏族。」我了解，這「誤會」是由於過去本地「一截罵一截」——每一小地區村落人群都自稱「漢人」，而稱上游人群為「蠻子」，他們也被下游人群辱稱為「蠻子」。就這樣，北川最西北角的上五寨村民，上游再也無人可被他們罵了，因此成為無可抵賴的「蠻子」。後來他們聽說「蠻子」就是「藏族」，所以在1970年代他們登記成為「藏族」。1980年代在本地知識分子鼓動下，本地大多數藏族都成為羌族。

在汶川、茂縣一帶，1950年代以前本地大多數人也沒聽過羌族。每一山溝中的村寨人群都稱本地人為「爾瑪」，稱上游人群為「赤部」，也就是蠻子，稱下游人群為「而」，也就是漢人。如此，每一小地域中的爾瑪都認為自身在會搶人的蠻子及狡滑的漢人包圍之中，同時他們也被上游人群視為「漢人」，被下游人群當作「蠻子」。早先，根據文獻以及曾參與1960年代民族識別的民族研究者回憶，當時他們認為羌族只有三萬餘人，主要在川西的汶川、理縣一帶。近年來我在岷江及大渡河流域藏族中的考察，同樣的，1950年代以前本地村寨居民幾乎都沒聽過「藏族」；他們是巴底人、巴旺人，或是自稱的「爾勒瑪」、「雅絨」、「顧鎗」等等。

在2003年出版《羌在漢藏之間》一書時，我依據當時新近的人口普查資料，認為羌族約有20萬人。但在災後，據報導羌族已有30萬人，顯然這些年來又有許多地方村落民眾被識別為羌族。這些新增的羌族，主要在北川縣與其北鄰平武縣。甚至在震災之後，為了爭奪、分享國家投入的龐大羌族文化重建基金，不僅北川的羌族村

持續增加，連陝西南部的寧強、略陽等地政府也稱本地有羌族及羌文化遺存。以我較熟悉的北川來講，在此我們很難說誰是真羌族、誰是假羌族。畢竟由明代以來，大量漢移民流入以及普遍的族群歧視，使得在20世紀上半葉本地絕大部分村落居民都自稱漢人。如今他們可振振有詞的說，我們原來便是羌族，只是許多人過去在大漢族主義壓迫下都成了假漢族。

由此看來，我們或可以同意許多「解構」中國近代國族之西方學者的看法：中國少數民族，以及包含漢族與55個少數民族的中國民族，皆為近代民族主義下的「建構」。同樣的學術邏輯也可以解構藏族、彝族，雖然學者們大多不願意這麼做。然而，且不論此說在學術認知上可能犯的錯誤與偏見，持如此見解之學者似乎從未在意「土著觀點」——少數民族如何看待他們當前的「民族」身分？我經常聽到羌、藏族老人們回憶過去各溝各村寨人群間的相互劫掠與仇殺，談起來都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感。他們說，那是過去的人沒「知識」，不知道大家是一個「民族」。

在羌族遭受震災打擊之後，社會對羌族的關懷、媒體報導與羌族知識分子的呼籲，激動羌族災民的民族認同，這是讓許多人得咬牙渡過家破人亡之痛的精神力量之一。我也聽得在災區從事災民心理治療與重建的心理學者稱，民族認同與民族文化對人們的確有療傷止痛之效。2008年3、4月間的西藏事件，拉薩首先傳出警民衝突事件，很快的川西、甘南、青海均有部分藏族響應——若非是「藏族」認同，何來如此的動員力量？也因此，許多學者(包括我自己)都有如此經驗：任何質疑民族一體性及民族歷史、文化典範性的族群認同研究，在青藏高原東緣的藏族、羌族、彝族地區都不受當地知識分子歡迎。那麼，作為一位學者，我們仍必須相信自己「我對你錯」的學術理論？堅持學術真理不受現實影響？

文化

汶川大地震之後，關心羌族的地質環境學者與人文社會學者間爆發了一場爭執。環境學者認為，汶川、茂縣、北川等地土質鬆動，不宜人居，應將本地民眾大舉遷於外地。許多人文社會學者則認為，羌族若整體遷離本土，錯居於漢族及其他民族之間，這個古老民族將逐漸失去其文化，同化於他族。許多羌族山溝中的農民堅決表示希望遷到較好、較安全的地方；有些羌族知識分子則表示，爲了延續羌族文化，羌族不應遷離故土。就在種種錯綜複雜的因素考量下，中國政府對羌族災後重建的最高原則——就地恢復或移地重建——曾遷延數月而遲遲無法定案。

目前看來，原地重建似乎是普遍原則。接著，受災羌族村寨要如何重建？學者們幾乎一致認為，羌族村寨重建一定要尊重並展現本民族文化特色。問題是，什麼是羌族文化特色？據我對各地羌族的了解，本地各溝各寨的婦女服飾、房屋建築、年節與婚喪習俗等方面都各有特色。簡單的說，愈靠西部、北部（如理縣、茂縣、松潘）的羌族便愈藏化，愈靠東邊與南邊（如北川與汶川）的羌族便愈漢化。可說是，羌族一地有一地的特色，一寨有一寨的習俗。這樣的文化現象是一種微觀社會過程的結果：在親近人群之間，居政治經濟優勢地位者對弱勢者所做的文化歧視、誇耀，與相對的，弱勢者對優勢者的模仿、攀附，造成整個青藏高原東緣人群靠近藏的便逐漸藏化，靠近漢的便逐漸漢化。最後，特別是這一地帶上的「羌族文化」，成爲漢、藏文化間的漸變光譜。

在過去（1950年代以前）由於資源匱乏，各溝之內的村寨間，溝與溝的人群之間，山溝與高原的農牧人群間，經常有暴力衝突。一

個最明顯的文化表徵便是，寨子都建在險要的半山或高山上；寨子裡一個個石砌房子緊靠在一起，中間只有狹窄過道。有時村寨中還有2、30公尺高的石碉樓，一種防衛性構築；若非資源競爭關係緊張，何需如此？災前許多羌族民眾仍住在如此的山溝村寨中，此乃無奈，有辦法的村民早在茂縣、汶川縣城或都江堰市買了房子。文化是社會現實本相的表徵；如石碉樓是資源競爭激烈此一社會本相的表徵。當今日羌族已非過去相互防範、敵對的「爾瑪」，而是彼此有民族認同及民族情感的羌族；如此若有更好的居處環境，為何他們必須住在山上？若有更堅固舒適的建材，他們為何要住在戶戶緊密相依相疊的石砌房子裡？

災後中國政府與許多學術單位、慈善機構投入羌族文化搶救及重建之中，最近累計將耗資超過10億人民幣的各種羌族文化重建與保護計劃紛紛啓動。問題是，要搶救何種文化？重建何種文化？目前最普遍被提及的羌族文化項目是：羌族村寨石屋及石碉樓、釋比文化、羌族歌庄（沙朗歌舞）、羌曆年、羌族服飾及羌繡、羌笛、轉山會、口弦，等等。建在山坡上的石築村寨及碉樓，如前所言，是過去村寨人群間資源競爭與暴力下的遺存；屋內的構造，配合著傳統農牧兼營的山間經濟生活。保存這樣的文化，是否也意味著相關的山區經濟生活及人類生態也不應改變？歌庄，也就是本地稱「沙朗」的一種歌舞，多年來本地流行的便是阿壩州統一創作、推行的「州歌庄」，以及各縣制定推廣的「縣歌庄」；這些歌庄唱詞的內容，沒有任何羌族說得出來。羌曆年，顧名思義這是羌族自己的新年，但這是1980年代末才由當地政府創造出來的文化，至今沒有任何羌族在家中過羌曆年，只有各縣辦的集體活動，或有經營旅游接待的村寨（如桃坪羌寨）才有羌曆年活動。釋比，漢語稱端公，這是南部羌族中混合本土信仰與漢人道教文化的民間祭師，但近十年

來，釋比文化只在民族旅游觀光活動中展出，在民間早就失去其傳承及意義——還有誰會在生病或時運不濟時找釋比作法治病消災呢？

20世紀上半葉的民族學、人類學為中國帶來「民族文化」這樣的概念，至今仍有不少人類學家排除萬難在各地人類社群中尋找「文化」，無論是功能的、結構的、象徵的，或是表現於人觀的。於是在中國西南，學者可以在某「少數民族村落」田野中建構該民族文化，無視於該村相當比例的漢族人口。在台灣，學者也可以在某原住民村落中建構該族特殊的文化，無視於本地及周遭其他族群居民的存在，也無視於村落居民與整體台灣社會環境之密切關係。災後的北川，許多本地知識菁英痛惜本地羌族文化毀於地震，而著手搶救、重建，事實上重建的是本地近百年來並不存在或早已消失的「文化」。這樣的想像，也常見於許多台灣原住民文化；儘管織繡、小米酒、打獵習俗早已消失殆盡，但在學者與本地菁英的想像與建構中，它們是永遠的台灣原住民文化。

什麼是「文化」，它有何種社會意義？是否「文化」對主流社會而言是一種過去，如傳統歷史文化，或是最新的風尚，如都市文化、流行文化，對少數民族或原住民來說則是由過去到現在不變的生活與思考方式？是否「文化」只是脫離或未及文明的一種和諧原始生活理想，如「原生態文化」，它保存在少數民族與原住民生活中，宜於讓身體充滿食物防腐劑的都市叢林人偶然體驗並驚嘆？是否「文化」是一種人群共性，相對於主流社會充滿多元、變化與個人抉擇，它存在於「結構性的」少數民族或原住民社會中，而使得他們無論是領導幹部、大學教授、深圳打工族、鄉民都難脫離此文化共性？

或者，「文化」單純只是現實生活的表徵？或只是人為了追求

安全、優越的社會存在，而對他者之行爲習俗的模仿、攀附與批評、誇耀、區分，如在社會與學術文化中一個年輕學者如何學著寫有關「原住民或少數民族文化」的論文？或者是，「文化」也被許多這樣的論文所創造，以印證並具體化當前的多數族群與少數民族區分，而少數民族或原住民也被「說服」而認可、實踐這樣的文化？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在中國最早發掘、書寫「苗族文化」的凌純聲、芮逸夫等人在湘西的經驗，以及此過去與現在的對比。當年在民族學及「民族」概念下，他們深入湘西鄉間採集苗民鼓舞、吃鼓臟等習俗，引起當地苗鄉士紳不滿。當時在民族歧視下，大家都普遍踐行漢文化習俗，因此凌與芮發掘本地不同於漢的習俗，在那些漢化的地方士紳看來無異是發人隱私。當時苗民士紳還去函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控告兩位中央研究院學者「以苗俗古陋，多方採集，製成影片，以爲談笑之資、娛樂之具、謀利之用」。今日，苗族文化仍被人們當作「娛樂之具、謀利之用」，然而展演文化者是以自身文化爲榮的苗族；而誰由此文化展演中謀得利益，或反蒙其害，問題就非常複雜了。

歷史

震災後，除了對受災者的哀憫外，大家對羌族的關懷相當一部分來自於一些流行的歷史記憶：「羌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羌族是古華夏民族中炎帝與大禹的後裔」。羌族受創，激起許多中國人對古老歷史的懷念與憶想。

不僅如此，在許多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當今羌族只是古羌人的一小群子遺，絕大多數的古代羌人都融入漢族、藏族、彝族與其他十餘種西南少數民族之中。特別是根據中國古文獻記載，今日青

藏高原東緣原為古代羌人所居，在吐蕃東進及藏傳佛教力量東傳後，本地羌人才逐漸成為藏族。更有歷史學者認為，整個青藏高原與甘肅的藏族都是古羌人的後代。因此今年3、4月間西藏發生的事件，以及長期以來漢、藏間剪不斷的糾葛，實因為「歷史」告訴大家，青藏高原及其鄰近地區都是古羌人的原鄉，而古羌人又是華夏的重要成分，因此藏族與藏地不能外於中國。

我們看看這「歷史」是如何說的。據成於5世紀的《後漢書》記載，西羌本出自三苗，他是古代四凶之一，也是姜姓族(炎帝之族)的旁系分支。三苗被舜帝流放到西方，成為所有羌人的祖先。同一記載又稱，秦國的一個奴隸無弋爰劍，因逃避追捕而來到青海東部的黃河上游，又因種種神蹟而被本地土著推尊為王，他的後人成為羌人各部落豪酋。然而，這只是中國古文獻的「一面之詞」。我們再看看古藏人如何說「歷史」。

西元7世紀至9世紀，吐蕃王國的政治勢力遍及青藏高原及其周鄰地區，此王國崩潰後，其宗教文化持續影響這些區域的人群，因此在知識菁英心目中逐漸形成一包含各部落人群的「吐蕃人」認同。14、15世紀古藏文獻中，有一種所有吐蕃人出於「六弟兄」之說。這「歷史」稱，吐蕃所有部族出於遠古的6個弟兄：查、祝、冬、噶四位兄長，及韋、達兩位弟弟。兩位弟弟，據稱是住在「漢藏交界處」，或說是在「大區交界處」，指的都是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也就是華夏心目中「羌人」所居的地方。藏文史籍描述及歌頌四位兄長的後裔，但對韋與達兩支人毫無描述更無頌揚。稱一些人是「小弟弟」或「被逐於邊境的壞弟弟」的後裔，稱他們住在與漢區「交界處」，都表達著在「吐蕃人」或藏人核心族群(指雅魯藏布江中、下游諸河谷人群)心目中，青藏高原東緣各部落人群在「我族」中的血緣與空間邊緣地位。